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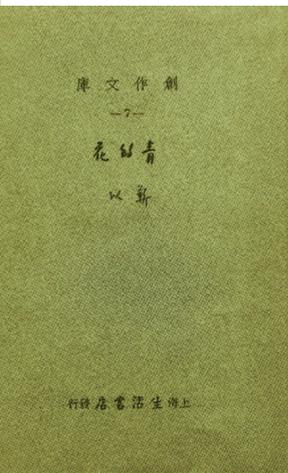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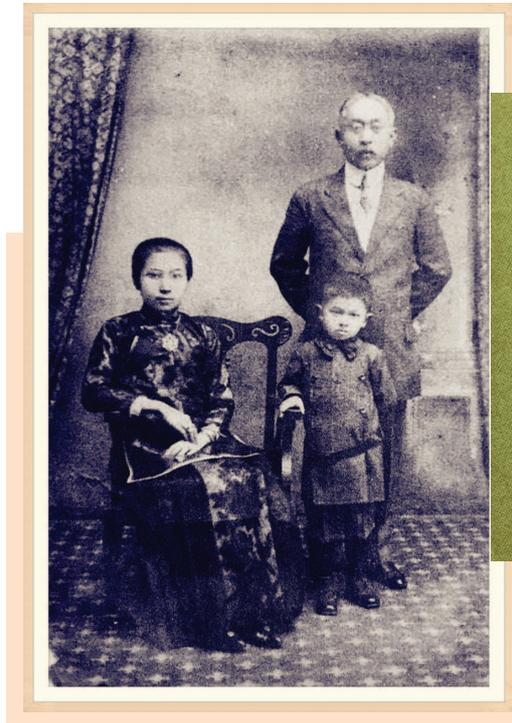
# 他是靳以笔下的“校长”原型

■ 张国伟

短篇小说《校长》是靳以先生的早期作品，讲述了一位老校长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故事。小说篇幅不长，约8000字左右，收入靳以早期短篇小说集《青的花》中，1934年8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后又收入《靳以短篇小说一集》，1937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校长》的故事没有奇峰险壑，但人物个性突出——这是靳以早期小说通常的表现手法。小说开头写校长与妻子彼此恩爱。校长下班回家，妻子在门口迎接他：“亲爱的，你回来了。”“她用了无限温柔的语调向他说，左手扶在窗沿上，右手握了一束紫色和白色的鲜花。这句话她每天都要说的，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厌烦，每一次他总以为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味。”中间一段写妻子病了，校长想方设法为她治病。“她在病中，他就一步也不离地守在那里。寂寞了的时候，他为她读些诗，当夜间她醒转来，月光下看见他是穿了睡衣在窗下祈祷着。她的泪顿然充满了眼睛。”最后篇幅写医生回天无力，妻子终于死了，校长非常悲伤。“从此以后，他过着最孤独，最悲伤的生活”，“现实的苦痛紧紧握着它”。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校长走出礼拜堂，“他的脚步，和手杖触到地上的声音，是很朗朗又很寂寞地一下一下响着”。

靳以笔下的“校长”原型是谁，他本人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我也没有查到有人对《校长》做过评介，或确认过“校长”的原型。根据我的判断，“校长”的人物原型，应该就是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李登辉（1872—



▲ 靳以短篇小说集《青的花》

◀ 上世纪20年代李登辉校长一家

1947)，字腾飞，印尼华侨，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6年起在复旦执教，1913年任校长。任校长期间，李登辉倾注心力，将复旦这所濒临关闭的私立学校，办成了屹立东南的名校。他爱校如家，无私奉献，深受广大师生爱戴。查复旦档案馆的《复旦大学同学录》，靳以于1927年秋入读复旦大学预科；1928年秋从预科毕业后升入商科；1929年秋在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就读；1932年毕业。靳以

在复旦求学的五年，正是李登辉担任校长时期，李登辉校长的言行及家庭变故，靳以应该耳闻目睹。因此，“校长”的人物形象，并非完全虚构。

《校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校长先生是一个和善可亲的老人。他长着圆圆的脸，皱纹在他的眼角，上额部密密地显出来。虽然只有50几岁，可是他的头发，在四年前就成为斑白的了。他虔诚地敬仰上帝，爱他的妻和所有

的学生们，那些学生，年龄上的差别很大，性情和志趣又难得相同；可是对于校长的敬爱，却是说不出因地一样。

这位校长，无论是外貌还是品性，非常贴近李登辉：靳以求学时，李登辉正好“50几岁”；从当年照片上看，李登辉确实是“圆圆的脸”，头发花白；他还是一个基督徒，早年曾加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虔诚地敬仰上帝”；他“爱他的妻和所有的学生们”，大家也敬爱他。耐人寻味的是，靳以特别提到，学生中志趣“难得相同”，这好像明明在说自

己——靳以虽然是商科生，但他真正的爱好是文学。

《校长》中的另一位主角，是校长的妻子，“她是一个将近40岁的女人，有黑黑的眼睛，是沉静的，却和他一样有和善的面像”。这也与李登辉校长的妻子汤佩琳非常吻合。汤佩琳生于1887年，比李登辉小15岁。他们于1907年结婚，婚后育有三男一女，但不幸先后夭亡。从此，夫妻俩相依为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复旦的教

学和建设。然而，1931年1月，汤佩琳因病去世，这对李登辉来说，又是一个沉痛打击。

在《校长》中，靳以对于失去爱妻的校长充满同情。例如，他写校长一直觉得妻子仍然活着，“有的时候又好像听见她用柔婉的声音叫他‘亲爱的’，有的时候又好像看见她倚在窗口站立，有的时候也觉得她那细腻的手在抚摸他的脸……”，“他常是一个人守在房里，眼睛像是呆定了的，默默地坐着。因为泪流得太多了，颊部发着油亮的光，就是平时眼睛也有一点模糊了……”现实生活中，李登辉确实一直难忘亡妻，他曾对别人说，夫人虽然走了，但他觉得她还在身边陪伴。“每当用餐，李登辉必定叫仆人准备两副刀叉餐具，餐桌上一应成对成双。这是25年来他与夫人面对面共餐的习惯。”（钱益民《李登辉传》）一位学生记得，汤佩琳师母去世后，有人“每晨去替这位伤心人整理床铺，在枕下搜出来的几条手帕，总是斑斑泪痕湿漉漉的，说明他独自中夜泣血”。（赵世洵《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晚年的李登辉视力衰退，几近失明，应该与他当年悲伤过度，“泪流得太多了”有关……《校长》中的细节刻画，与历史事实若合符节，非常一致。

李登辉一生淡泊、低调。在他晚年，有人要为他写传记和年谱，也被他婉言谢绝：“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然而，作为毕业不久的复旦学生，靳以却将老校长的生平片段写进了小说，这大概是李登辉校长不曾预料到的。

（上接第一版）一次，宗英大姐与忘年交李辉无意间说起此事，曾为黄宗英、冯亦代、赵丹编过书的李辉，感到把两地的情书汇编成书信集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向她鼓动。宗英大姐经不住李辉的劝说，答应了。后来在李辉的介绍下，作家出版社很快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而此书责任编辑由李辉夫人应红担纲，起印三万册。

2005年8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出版了。可是，就在出版数月前，宗英大姐心爱的冯二哥离开了人世，她怀着悲痛之情给冯亦代写了封天堂人间两相隔的“情书”作为《纯爱》序言。这篇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文章最后写道：“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愈加爱你的小妹。”

在宗英大姐送我的签名本中，唯独这本“情书”是没签名的，我也没有勉为其难。我至今保存着一大叠宗英大姐托我邮寄“情书”的名单，足有百十号人，还火急火燎地不时追加。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寄书名给你后，还有十多廿来人未寄，帮我寄吧，说北京买不到，打电话来讨书的。”在她托我寄《纯爱》的一长串名单中，有季羨林、袁庚、徐凤翔、侯隽、舒乙、董秀玉、周明……

## 她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

宗英大姐送我的书上题得最多的字是“谢我知音”，有时也会让我惊喜一下，比如在赠我的电影版连环画《家》上题：

“陆正伟好友，你是我的‘家’里人。龙年之秋于华东医院。”晚年，宗英大姐把送书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她曾在北京返沪前夕给我的信中写道：“为自己的《上了年纪的禅思》以毛笔题词，签名，盖章156册（自己找累），累得像刚跑完5000米火炬跑，兴奋得停不住，我赶快去民航，挂内科急诊。”我心想，这是天生的性格，让她改也难。

数年前，新书一到，宗英大姐就托我把题签过的书成十上百地往外送，其中有《卖艺人家》《百衲衣》《七人集》《纯爱》等，用她的话来说：“钱从书里来，又到书里去。”出版社给的稿酬，还不够她送书的呢。我记得《七人集》出版后，作协给了宗英大姐100本，她像发牌似的很快送完了，又自掏腰包买了不少。就连陌生人讨书，她都会给。一次，宗英大姐转给我一个别人寄给她的信封，背面写道：“寄你此读者函，请在《卖艺人家》书到后，将《纯爱》一并寄给盐场小学的老师。”

宗英大姐在病房的小桌上完成了南通市赵丹纪念馆约她撰写的一篇自传，临近退休的主任医生郑安琳见了便想收藏这份手稿以作留念，但碍于情面没有开口。宗英大姐看出了他的心思，慷慨地将这份有着五六万字的手稿赠予了郑大夫。当我表示惋惜时，她只淡淡地说了句：“他喜欢，我就给他了。”

我有一位朋友平时爱淘各种老版本的旧书，他在上海书店偶然发现一本纸页泛黄的黄宗英早期作品《爱的故事》，便花0.15元买了下来，托我请宗英大姐在书上签个名。这天，我把那本旧书刚放到小桌上还未开口，她伸手已把书拿在手上了，

神情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骨肉”，抱在怀里深怕再得而复失似的。随后她告诉我，这是她的处女作，家里原有的藏书经过几次动乱，已散失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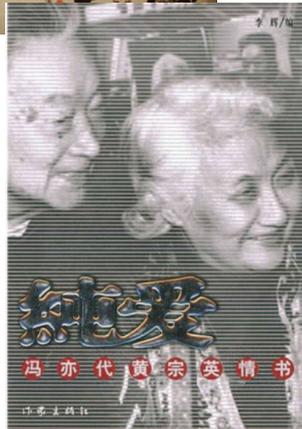
这本薄薄的书勾起了宗英大姐的回忆。1950年10月，黄宗英应邀出席在苏联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那年她才25岁，同行的有巴金、马寅初、金仲华、袁雪芬、刘良模。会议期间，他们到波兰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居民废墟以及工厂、古城。回国后，黄宗英陆续写了一些见闻和观感，1952年集结出版了这本小书。宗英大姐提笔在书上为这位“有心人”写了封“感谢信”：“浦建明同志：谢谢你让我看到半个世纪前的自己，并初识了您这位知音，幸甚。黄宗英于上海华东医院，2006年11月24日，美国感恩节。”

我在与宗英大姐的交往中，发现她对身外之物看得格外淡薄，而乐善好施的情结又特别浓厚，只要听见有人遇到困难，她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她一度把银行工资卡托我保管，每当我告诉她涨工资的消息时，她都会说：“又加工资了，老百姓要有意见啦。”我忙对她解释：“不单是给你们局级离休干部加，是普加，大家都有份。”她听后不吱声。

2008年5月30日，宗英大姐给我来信说：“请在6月份为我取工资时，从我银行账号里取一万元，代我捐助汶川地震，汇费从工资中扣……”她虽长年住在医院里，但信息并不闭塞。一次，她不知从何渠道得知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学生高河然患晚期急性淋巴白血病，生命已危在旦夕，立刻让作协的金嵩以“黄大姐”之名通过银行汇款捐助了一万元。



▲ 《归隐书林》和《纯爱》见证了冯亦代和黄宗英之间动人心魄的黄昏恋



而今，20多年过去了，今年4月，我去看望这位已是九五之尊的老人时，她每天除了读书看报外，还手握软笔日记呢。

我想，宗英大姐身上那股子浑然天成的天真，就是她无论在表演艺术上还是从事文学创作方面最为宝贵的本源。我祝愿她艺术之树常青，为读者创作出更多的名篇佳作。